

胜 迹



多座古桥遗址再证“水绕长安”

“2022年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后,关注度不断提升,六大考古中有两项跟桥梁遗址有关,分别是西安三殿汉代古桥遗址和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前者是迄今为止在泾河流域考古发现的唯一一座汉代古桥,或与汉文帝霸陵营建有关;后者是都城礼制的最高等级,体现了大唐威仪。

殊不知,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桥梁遗址作为重要考古发现数次出现在公众面前,这让以桥为背景的历史事件有了确切的“原生地”,同时也实证了古都长安城处于水系交错的环境中。

三殿汉代古桥

位于西安东三环东侧
为寻找汉文帝“顾成庙”提供重要线索

在3月12日公布的陕西2022年度六大考古新发现中,西安三殿汉代古桥作为唯一一个首次公开的考古发掘项目而引人注目——从去年9月份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为配合城市建设项目,在东三环东侧,西安红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西北侧(西距泾河400米)发掘清理出一座汉代古桥,填补了这一区域内古桥遗址的考古空白。

目前共发现桥桩874根,宗地范围内桥体残长74.64米、宽20.54米,桥桩基本上成排分布,呈西北—东南走向,方向156度。根据木桩分布情况及碳十四测年数据分析,发现较明显的规律,方形木桩和圆形粗木桩年代较早,布局较规整,应为西汉早期始建桥梁时所建;大部分圆形细木桩位于方形木桩、圆形粗木桩之间,分布规律性不强,且年代较晚,或为西汉至东汉时期修补桥梁时所立。

通过观察解剖沟剖面,发现桥桩之上存在着多层因河流流动及改道形成的沙层和卵石层,说明在桥梁废弃后,该区域经历了多次河流冲刷及改道,除木桩外,其他桥梁结构及周边遗物已完全不存。

三殿汉代古桥是迄今为止在泾河流域考古发现的唯一一座汉代古桥,东西跨度大,南北宽度宽,桥桩密集,是汉代高等级桥梁的代表,为研究汉代桥梁构造及修补过程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该桥正对西汉薄太后南陵及汉文帝霸陵,是帝陵营建这一汉代重大国家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桥位于南陵、霸陵与汉长安城之间,为研究汉代道路交通路线提供了重要参考。根据文献“南陵桥环,衣冠道绝”的记载,推测其可能为“南陵桥”,为进一步寻找文帝“顾成庙”提供了重要线索,对研究西汉衣冠道及早期陵庙制度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沙河古桥遗址

位于西安西的咸阳市秦都区
为帝王狩猎提供交通便利

日前,咸阳沙河古桥遗址又有新发现,考古工作者在新一轮考古发掘中发现了17根秦汉时期桥桩及一处用于保护河岸的“埽岸”遗迹。

沙河古桥遗址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的沙河古河道内。这一遗址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在1989年结束的第一轮考古发掘中,发现了秦汉时期一号桥和隋唐时期二号桥两处遗址。两座桥相距330米,均采用原木为桥桩,经专家检测,桥桩为楠、杉、樟、柏、松等树木构成。

两座桥均宽16米,据文献所载,根据当时河道的宽度推测,这座桥长约500米。在桥址附近还出土有秦汉时期的铜器、铁器、砖瓦等文物100件,被评为1989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2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这一遗址再次进行了考古发掘。考古人员在古桥遗址一号桥保护大棚南北两端新发现木质桥桩3排共17根,



与保护大棚内桥桩方向基本一致,同时发现的“埽岸”遗迹则进一步确定了一号桥的长度及范围。(“埽”是古代水利工程中的建筑构件,是用薪柴、竹木等软料夹以土石制成,若干“埽”用绳、木桩联系起来用以保护河岸就是“埽岸”。)

考古人员通过对发掘中包裹淤泥层的编织物等6件样品进行测年,可知沙河古桥一号桥的建造年代为秦汉时期,推测其功能可能是为满足帝王游猎的交通需求而建。

渭桥遗址



汉文帝入京继位大统、南匈奴单于归顺入京等一系列重要大事,均发生于渭桥之上……渭河古桥的发现,让发生在此地的历史事件找到了“原生地”。

渭桥遗址位于西安市北郊汉长安城遗址北侧渭河故道,发掘前为鱼塘所在,2012年4月上旬,在鱼塘挖沙中暴露木桩,后经调查确认为古桥遗存,并测量确定南对汉长安城北侧城门厨城门,编号“厨城门一号桥”。之后,相继发现“洛城门桥”“厨城门二号桥”“厨城门三号桥”和“王家堡桥”“厨城门四号桥”及“厨城门五号桥”等共3组7座渭桥。

厨城门一号桥,正南1200米左右为长安城厨城门遗址,直北3000米左右为今渭河南岸大堤,向东与洛城门桥相距约1700米。经发掘确定,厨城门一号桥为南北向木梁柱桥,横跨于东西流淌的渭河之上,南北估计长880米左右,使用时间较长,应经多次维修、续建。从考古人员清理出的桥梁所在河道堆积物中推测,该桥可能始建于秦,为汉使用,沿用到唐或更晚的宋代,之后废弃,前后延续达1000余年。

厨城门三号桥位于厨城门一号桥东约200米,桥桩用材多为硬木松类,时代相当于唐代;厨城I四号桥位于一号桥西约40米,大体为战国晚期;洛城门桥正南750米为长安城北墙东侧城门洛城门,直北3500米左右为今渭河南岸大堤,该桥大体相当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

西汉长安城渭桥遗址入选“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灞桥遗址



“若长虹之未翻”,唐代诗人王昌龄曾在《灞桥赋》中描绘过灞桥的恢弘景象。唐朝时,灞桥上设立驿站,凡送别亲人好友东去,一般都要送到灞桥后才分手,并折下桥头柳枝相赠,久而久之,“灞桥折柳赠别”便成了特有的习俗。

1994年4月,农民挖沙时在现今西安市灞桥区柳巷村灞河河道下发现一件石刻龙头,随后考古人员在此进行抢救性发掘,据发掘实物和文献资料证实,该桥即久负盛名的古灞桥遗址。

灞桥为一大型半圆拱厚墩联拱石桥,处于当时隋大兴、唐长安城通往潼关路、蒲津关路、蓝田关路的要冲,是我国现存时代最早、规模最为宏大、桥面跨度最长的一座大型多孔石拱桥,始建于隋初,废弃于元,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

该遗址的发现被评为当年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并在此后被列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4年9月,在洪水的冲刷下,灞桥遗址再次显露出来,在灞河河道正中心发现11座桥墩,总长约400米,均为块石砌筑而成,块石之间以铆钉连接,桥墩的具体情况与1994年的发掘基本一致。

作为沟通当时都城与广大关东地区的纽带,隋灞桥是隋唐都城长安的重要配套工程,也是一项宏伟的国家工程,因此无论在建造工艺还是艺术装饰方面,均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杨利娜

压题图为三殿汉代古桥废弃桥梁。

民 俗

黄河流域种小麦的地方,都有面花。陕西关中地区的面花相比于其他省份,有着独特的审美取向。这是由当地的经济发达程度与审美趣味所决定的。黄河东岸的山西、河南,因为经济稍显发达,现代化程度略高,面花已经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样式与原始含义,显得过于世俗花哨。青海、甘肃一带黄河西岸省份的面花,却因为经济欠佳而使得面花的丰富性略显不够。只有陕西面花,因为经济处在半发展状态,加之当地保守持重的文化底蕴,一方面保留着原始文化的经典意象,一方面又昭示着现代气息。虽然经过世事的变化和民俗同质化的不断演进,给面花艺术打上了世俗化和现代化的文化烙印,但我们剥开它的表层,仍能看到它原始文化的发达根系。尤其是在农耕文化相对发达而现代产业发育不足、文化相对闭塞的关中地区,面花艺术以其独特的意象让全国乃至全世界都为之迷迭倾倒。

关中人的“活命”艺术

我们这里说的“活命”,并不完全是指吃穿用度的生存维度,并非指温饱生活,同样还有情感的释放、心灵的回归和灵魂的安放之所在。

吃当然是人生的第一要素。关中属于渭河冲积平原,这里盛产小麦,面粉也是关中人主要的生活食材。所以在关中地区,面食最为丰富。相较之,馒头因为便携带、易存放而更受当地人的青睐。人们过去出远门、下地劳动,只要带几个馒头就不会挨饿。关中人把馒头称为“馍”,面花就叫“花馍”。一般的馍是平时自己吃的,花馍则是在岁时节令、婚丧嫁娶、满月寿礼以及走亲访友时才会用到。因此,面花便超越了吃饭的功能,有了某种象征与隐喻。

这里说的所谓“活命”,是指人们在满足了果腹之欲以后,将人生的礼仪与交往都移植到其上,成为一种生命意义的寄存,是情感寄寓的信物。

过节的时候自然要用到馍,其种类也是比较丰富的。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华州区的马蹄馍与韩城市的看忙馍。马蹄馍,就是形状像马蹄状的馍,是过年时人们走亲戚的必带物。一般是走亲戚拜年时,客人带的两个馍。如果主人将馍收下,临走时给客人退还一个,就表明两家还会继续往来。如果不退或者全部退回,就意味着对方要和你绝交,说明这一年里你有什么事情没做好,得罪了对方。客人回到家就得反思,想自己什么事情没做好,找个合适的日子上门赔礼道歉,以取得对方原谅,这样才能重修旧好,以便再来往。

看忙馍,就是在收麦的时候,母亲最忙的时日,女儿要回家看母亲,回娘家自然要带馍作为礼物。关中是产麦区,过去因为机械化相对较差,人在这时是最忙的。在这个节点上,女儿回家看母亲,给母亲帮忙,是关中地区作为周礼发祥地的充分体现。生为父母,人当孝之,在她忙的时候,女儿定然要回家探望并帮助的。馍则是过去最基本的礼物。

最能体现礼仪文化的面花,都在人生仪节中。一个人生下来,满月要给他蒸一个囫囵馍,即一个很大的圈圈将他套住,以期其生命的圆满与周全。过岁的时候,外家要给他送灯馍,有的地方也叫蛭馍,这中间有化茧成蝶的意思。而这样的灯馍,一直要送到十二岁他一个生肖周期过完。民间有“外甥打灯笼——照旧(舅)”的说法,就因此而来。结婚订婚自不用说,各地的讲究与面花样式虽不一致,但蒸面花的习俗是不能少的。这时蒸得最多的是虎面花和鱼面花,有生殖崇拜的意蕴在中间。而当一个人活到六十岁,就可以享受寿礼待遇,家人给他蒸一个很大的糕,以庆祝他人生的成就与长寿。而当人去世了,后人们为了追思其恩,也会给他蒸各类祭饭,最经典的就是花馍。

原始文化的存续见证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关中面花,仍留存着中国原始社会的图腾文化、巫文化、生殖崇拜、祭祀文化的

关中面花的美学气象

内容,并固化成一种礼仪仪式,呈现在各种文化活动中。同时,它也凝聚着中国人的诗性智慧、隐喻象征、装饰打扮等美学内容,并固化成了一个文化符号。从这些生动的造型上,既可以看到黄帝部落的父性文化,也可以看到炎帝部落的母性文化。既有母性文化的虎、凤、兔、荷等生殖崇拜图腾,也有父性文化的龙、蛇、鱼等生殖崇拜图腾;既有对祖先、神灵的敬仰,又有对现时生命的护佑。而这些文化内涵,又都附着在一个个的节日和生辰寿诞以及婚嫁嫁娶之中,附着在一个个鲜活的花馍造型上。作为一种中国文化符号,它一代代传承了下来。我们也只有从这些民间艺术中,才能寻找到中国文化的根。所有的民间艺术,都沿袭着神话的原型,都打上了先民们解释世界的幻想烙印。这种烙印随着社会的世俗化进程,已经掩藏在了历史的尘烟之中,让我们一时很难看到它的真面目。只有透过层层迷雾,剥茧抽丝,才能看到它的原始意象。

馄饨,在关中指的一种花馍,有包馅的,也有不包馅的。当地最常见的为虎馄饨与鱼馄饨,一般为结婚、订婚时所用。何以用馄饨给一种食品命名,笔者的考察是它与创世神话有关,与生殖图腾有关。鉴于篇幅的关系这里不能展开讨论,但它基本代表了盘古开天辟地的“混沌”传说以及早期人类对于虎图腾与鱼的生殖崇拜有关。

另外,在关中地区见得较多的是蛙馍、凤鸟馍,即以青蛙与凤鸟为造型的面花。前者当然是与女娲造人的传说有关,后者则与太阳崇拜有关。而鸟鱼组合面花,是以鸟头鱼身为主要造型的。这种意象在大地湾仰韶彩陶中可以看到,与新石器文化一脉相承。渭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其面花的品类,都有许多方面的人类原始文化遗存。

成双成对的对称之美

除了满月的囫囵馍与老人过寿的寿糕、祭祀用的大糕以外,关中面花都是以成双成对的形式出现在各种场合。结婚、订婚的时候,给对方送的花馍是成对的。女方给男方送一对老虎,男方给女方送一对鱼。走亲戚送的馍一定是双数的,如上面我们说华州区送给亲戚的马蹄馍是两个。陕西人有单个不送人的讲究,完全是一种对称的仪式感。

对称是人们对于形式美的要求,给人以圆满、匀称、稳重、平衡之感。它也是中国人阴阳观念的充分体现。有日有月、道分阴阳;左右上下,南北东西;人分男女、年存长短。中国人对于对称是情有独钟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式对称,不仅仅是一种美学理念,更是一种精神追求。国人成语中有“好事成双”一词,最能表达国人对成双成对美好寓意的喜爱。因此,对称的美,亦是圆满吉祥的美。对外,它代表两手齐抓;对内,则是长幼有序,儿女双全的秩序。成双成对的关中面花,是对传统美学的最好诠释。

有关关中面花的美学意蕴,靠这点文字说不清楚。有兴趣的同仁,可以去关中大地走走,亲身体验它的美学意味。

□王海琨



鸡馍,与远古人们对太阳的崇拜有关。古代帝王有祭日的传统,民间艺术正是对古代风俗作了一个完美的映照。

鉴 藏



年代:宋代
收藏单位:宝鸡市眉县博物馆
伯卫铭文铜镜,直径8.5厘米,厚0.9厘米,重0.22千克。该铜镜整体呈圆形,半球形钮,立缘,无钮座,内区有“伯卫(wèi)”二字,内外区之间被高凸棱隔

伯卫铭文铜镜

开,外区素缘内斜折。

汉镜制作精巧厚重,字体多样,文辞内容丰富;唐镜纹饰富丽绚烂,蓬勃向上。与汉、唐镜对比,宋镜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镜形多样,主要有圆形、葵花形、长方形、菱花形、圆角方形、心形、鼎形、瓶形等;二是铭文独特,镜铭中出现州名、作者姓名、“照子”等字样,这是在其他时代所没有的;三是镜背多素面,尤其是著名的湖州镜,大多为素镜型制,镜背有纹饰的较为少见,就算有也都十分简单。

□杨沛